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 跨世纪发展问题的若干思考

李守庸

所谓世纪,原来无非是西方人通用的一种纪年的方式,并将这种纪年方式称之为“公元”。即从传说中耶稣降生时的那一年算起,称作公元元年,以后每过 100 年称为一个世纪。现在到了距传说中耶稣降生的那一年已有 1997 年,因此一般称作已接近第 20 世纪之末;到了公元 2000 年(一说为 2001 年),从这一年算起,就算进入第 21 世纪了。现在几乎在全世界被人们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跨世纪”;无非就是这个意思。顺便说说,我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那一年起,也正式采用这种纪年方式,并称为公元 1949 年。从这个意义上看,“跨世纪”,也无非就是说用人们自己设定的(即人为的)用以纪年的一种方式计算,现在即将从传说中耶稣降生后的第 20 个 100 年进入第 21 个 100 年,即 21 世纪。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然而,尽管世纪、跨世纪,无非是人们自己设定的一种对于时代向前推移的纪年的方式,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即人们所说的“跨世纪”时代,与过去相比,人类社会确实发生了一些十分重大的甚至可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举其荦荦大者而言,在经济领域,人类正在进入信息、生命工程时代。从总体上看,生产力相对于上一个世纪而言,甚至相对于 30 年、20 年、10 年以前而言,可说正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然而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却仍然存在,而且很大,有些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甚至越来越大。在政治领域,国际形势总体上趋向缓和,两极对抗的局面基本上已为多极发展所替代;资本主义世界处于政治相对稳定时期;原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变色,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正日益强大、欣欣向荣,成为处于低潮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在思想文化领域,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的总体文化教育水平日益提高,在意识形态上既仍然存在众多的原则分歧,但亦逐渐出现了求同存异的趋势。在以上这种背景之下,和平与发展几乎成为当今世界基本取得共识的时代的主题。

和平与发展是相关而且相互为用的两件事。从世界总体上说,只有在和平的条件下,发展才有可能;而发展又有助于和平的稳定。就全人类而论,发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可以说是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基础。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看来这正是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所作出的正确的重大决策。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要发展生产力,关键之一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大力调整生产关系,进一步加强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然要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迅速而稳步地前进。而在总结经验教训中，固然应当主要是总结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实际经济生活中的经验教训，但也必然包括总结经济思想与理论上的经验教训。总结经济思想与理论上的经验教训，固然又应以总结建国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经济思想与理论上的经验教训为主；但由于从人类进入奴隶制社会以来直至近现代，以至当代，有许多社会经济现象、经济问题具有不同程度的共性，因此，为了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为了稳步而迅速地发展生产力，为了使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下半个世纪之内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以至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在这还剩下一年多的时间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跨世纪”时代，确实是时代所赋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新的、历史的使命。

二

我认为，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总结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理论方面的经验教训，基本上包括两大内容。第一，是人们对于各种经济关系的认识，例如对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环节，以及对于这些环节之间的关系的认识。第二，是人们基于对各种经济关系的不同程度的认识，而提出的各种经济见解、主张、政策方案等等。而所有这些认识和见解、主张、政策方案等等，无疑是依据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背景和人们的认识水平而形成的。对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理论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的总结，在中国，自很早以来就有人进行过。近代以来，更有人开始用较为科学的方法进行这种研究工作，甚至提出过接近于建立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设想。至本世纪 20 年代以迄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可谓已在逐步建立之中，并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无论是对于中国历史上人们有关经济关系的认识或基于不同认识程度而提出的各种经济见解、主张、政策方案等等的内容及其在思想理论上的经验教训，都有所论述、总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不过主要由于这时的研究者们，很少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作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理论依据，因此成就不大。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下，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取得较快、较大的发展。在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总结中国历史上人们对各种经济关系的认识和基于不同的认识程度而提出的经济见解、主张、政策方案等等的经验教训方面，取得了较为重大的成就。然而面对“跨世纪”时代的要求，所取得的成就应当说还是很不夠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总结中国历史上人们对各种经济关系的认识和基于不同程度的认识而提出的经济见解、主张、政策方案等等的经验教训方面，必须进一步作出适应于时代要求的更大的贡献。为了朝这个方向努力，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大问题值得探讨。

首先，方法论问题。上面说过，新中国建立以来，主要由于运用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作为指导思想，才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较为迅速地取得了较为重大的成就。但无庸讳言，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方法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中国当时时代的影响，曾经严重地存在过“左”的教条主义倾向。这又无疑是阻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这一时期内取得本应取得的更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自 70 年代末国家采取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以来，随着全国性的政治以及学术环境的逐步改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领域中的“左”的教条主义倾向也逐步有所克服。但积重难返，这方面的痕迹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并有时在一些学术著作中不同程度地有所反映。今后，如何在经济

思想史的研究中——在总结历史上人们对经济关系的认识和基于不同程度的认识而提出的经济见解、主张、政策方案等方面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继续坚决地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倾向，仍然是摆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方法论上，我认为，在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历史观、方法论的前提下，还必须同时有分析、有选择地吸收与容纳国外学者研究经济思想史及有关学科中带有科学性的新的观点与方法。

其次，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宽的问题。在这方面，我认为为了适应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有两点最为值得注意：第一，是对中国历史上某些重大的经济思想、理论作专题性的研究。举例而言，如果从历史上研究与总结人们在如何求得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如何对待与处理经济干预与经济放任之间的关系，如何保持生态平衡和保护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如何对待与处理物质利益与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商品、货币、市场、价值规律等方面所作的探索，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及其经验教训，这无疑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稳步的发展，会起到较为重大的借鉴作用。第二，是加强对于现当代、尤其是当代经济思想的研究。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里仅举一个例子。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有众多的学者不断从事中国当代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为国家提供经济决策的理论依据、为新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但是同样由于时代条件的影响，这些研究往往受到很大的限制，未能取得应有的更大的成果。除方法论上“左”的教条主义的羁绊之外，还由于一定的政治条件的制约，“不是政策以理论为依据，而是理论以政策为依据”和“理论跟着政策转、跟着政策跑”的现象曾经相当普遍、严重而较为长期地存在过。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这种局面有所改变，但同样由于积重难返，这种局面至今仍不能说已经完全改变。同时也应看到，即令同样处于上述背景之下，仍然有少数经济学者，卓然独立，坚持真理，从实际而不是从当时的某些在以后看来并不正确的政策出发，勇敢地力排众议，提出真正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科学的、卓越的见解与主张。尽管这类学者在当时往往是比较孤立的，受到其他众多学者的非议或批判，甚或为此而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历史终于证明了他们当时的见解、主张是正确的。如果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当代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类现象，并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这对于中国经济理论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以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能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克思的《资本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相媲美的经济学巨著的早日产生、面世，或许不无裨益。

再次，促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走向世界和促使中国丰富的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融入世界经济思想史、学说史学科的问题。我在这里所用的“走向”与“融入”两个概念可能都不够确切。前者是指让外国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学者了解中国历史上有丰富的经济思想遗产，知道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正如中国人、中国学者较为熟知外国有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外国有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这样一门学科一样。后者则指在作为研究与总结人类经济思想、学说、理论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的专门著作中，中国经济思想史理应占有一席相应的、重要的地位。

先说前者，即促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走向世界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较早地被介绍到外国，并为相当一部分外国学者所熟知，以至推崇和研究。相对而言，中国历史上丰富的经济思想遗产，除据认为18世纪时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重

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对之有所了解，并对他的经济学说的形成有所影响；和近现代的日本学者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不但了解较多，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上有一些成果，以及尚有少量与经济思想有关的中国古籍的外文译本，自本世纪以来先后在欧美有一些国家出版之外，总的看来，外国学术界对中国极其丰富的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及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与成就，仍处于所知甚少的状态之中。再就我国学者向国外介绍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方面的学术理论成就而言，也是做得很不够的。据我所知，最早向外国介绍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成就的，可能是陈焕章，他于本世纪早期在美国用英文著有《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其后李肇义于30年代中期用法文著有一本《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各大流派》。新中国成立以来，胡寄窗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和《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两书的英文本先后出版。此外，近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还有不少专业工作者出国或留学、或做研究工作、或考察访问作学术交流，所有这些，无疑对于让更多的外国人、外国学者了解中国丰富的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为了使更多的外国人、外国学者了解中国丰富的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并让这种历史遗产为人类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应该说，在这方面尚有许多许多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其中我认为尤为重要的，是将更多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重要专著、论文，译为外文出版；或直接用外文撰著在国外出版，或直接向国外有关刊物投稿。

再说后者，即如何促使中国丰富的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融入世界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学科之中。主要由于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中国历史上丰富的经济思想遗产几乎从来不被外国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的研究者所重视以至承认。除大家已经熟知的，例如一位美国学者曾经说过“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东西可以与西方国家中世纪僧侣们所作出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之外，还有一位著名而且堪称严谨的美国经济学家，即约瑟夫·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这一巨幅专著中，虽然称赞中国“是我们所知道的具有最古老文字文化的地方”；并说在中国古代，“由一再发生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现象，无疑曾经受到文化修养远比我们高的人的注意和讨论”；但他仍然坚持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留传下来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即对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经济学说、经济理论，仍持否定或至少是怀疑的态度。至于其他西方学者撰著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中，不包括、不涉及中国历史上从古代以迄近现代的经济思想，则几乎已成惯例了。据我所知，唯一例外的，是1954年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在其第一篇第三章“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最后一节即“封建主义时代的经济观点”一节内，曾经以极其简略的文字（约200余字）提到了“中国封建主义时代的经济观点”，而其所介绍的“经济观点”的内容，则似只可以“离谱”二字以概之。不仅如此，即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自己的学者们所撰著的经济学说史一类专著而言，不少冠以《经济学说史》之类的书名，而当其论及古代、近代的经济思想、经济学说时，对于中国古代、近代的经济思想、学说则只字不提。再举一例，为了研究现代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经济学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一门新兴学科——发展经济学。近年来，更有学者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经济发展思想在历史上出现与发展的脉络。而在无论是外国或中国学者所撰著的这一类专著中，都完全忽视以至断然否定在西方重商主义之前，在人类社会中出现过经济发展思想。然而，就笔者所知，即令仅就中国而论，从先秦以来，就早已出现、存在过内容极其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要促使中国极其丰富的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在世界经济思想史、学说史或其分支学科中占有一席之地，其难度之大，于此亦可见一斑。值得庆幸的是，已故的胡寄窗先生于其生前出版了从世界经济学说史

的角度撰著而将中国经济思想列于重要地位的《政治经济学前史》一书，该书按历史时期分为五个部分，几乎每一部分均将中国经济思想作为重要的一章（只有第一部分作为一节）列入，实现了其生前的遗愿，也为促使将中国丰富的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融入世界经济思想史、学说史学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尽管如此，而要使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得到西方学者较为普遍的承认、重视，真正被融入世界经济思想史、学说史学科领域，我们还必须继续作更大的努力，甚至要作几代人的努力。

最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理论队伍建设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日益增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本、专科生的一门必修或选修课程在许多有关的高等院校相继设置；具有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硕士与博士学位研究生条件的单位与指导教师也逐渐增加。所有这些，均说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理论队伍正在逐渐成长与壮大。但相对于时代所赋予该学科的历史使命的要求而言，还必须进一步努力加强学科理论队伍的建设。为此，我认为当前应主要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争取有更多的高等院校在本、专科生中设置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视主、客观条件而定，或作为必修课，或作为指定选修课，或作为一般选修课；或在相关课程，如经济学说史、中国经济史之类课程中，作为章节增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或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某些分支学科作为必修或选修课设置。

第二，争取有更多的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为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硕士生、博士生创造条件。最近，国家教委在修改后的专业目录中，将原属于二级学科的中国思想史改为三级学科，而置于“经济思想史”这一二级学科之下，即在经济思想史这一二级学科之下涵有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这样三个三级学科。这样就使原具有招收经济学说史、西方经济思想史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之类学科硕士、博士生资格的单位，在一定条件下（主要是师资条件），即可在“经济思想史”这一二级学科的涵盖之内，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硕士生或博士生。可以说，这已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培养更多的高层次研究人才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客观条件，现在似只有待于加强主观上的努力。

第三，从社会的角度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我于近期发现，有愈来愈多的撰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论著的作者，并非该学科的专业研究者。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专业工作者，似宜及时地与这些学者建立联系，相互切磋，以期有利于学科的发展。

注释：

参见〔比〕曼德尔著：《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译本，下卷，4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李氏此书名在国内出现过几种不同译法，本文采用曼德尔书中译本之译名。究以何者为是，待考。

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著：《经济分析史》，中译本，第1卷，8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参见〔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译本，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参见李守庸著：《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思想初探——兼论经济发展思想不始于西方近代》，载《经济评论》，1993（2）；又载《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曾国安）